

本刊特稿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从现在开始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3 年 4 月 26 日,辽宁大学宋则行名家大讲堂专门邀请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作专题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的实现路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以及辽宁怎样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做好东北振兴的“三篇大文章”、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解读、分析和探讨。《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经作者授权整理,重新编辑全文刊发。我们相信,文章将为推动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以及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做出重要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的实现路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林毅夫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 要: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的实现路径进行阐释和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在内涵与特征方面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实现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下,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辽宁应该按照比较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在政府因势利导作用下,根据不同产业的特性来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辽宁

中图分类号:F120.3;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23)03-0001-10

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倡导者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在辽宁大学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平台来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深化。我们提出新的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现在全国上下包括辽宁都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要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在此借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的契机到辽宁大学来做宋则行名家大讲堂讲座,主要来谈谈我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些学习心得,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从现在开始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想这也是全国同样是辽宁的首要任务。据我了解,辽宁正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辽宁在做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我也想结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来谈谈辽宁怎样以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来做好东北振兴的“三篇大

收稿日期:2023-04-30

作者信息: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文章”,贡献于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一、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谈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现代化则是相对于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形态而言,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开始时基本上都是农业经济社会,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一般人都是在生存线边缘,如果收成好一点,肚子就吃得饱一点,如果收成少,就要发生饥荒。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平的时间长了以后,人口增加,耕地就不够,就会出现为了抢夺资源而发生战争、朝代变化,人口由此锐减来平衡人地矛盾,这种状况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从历史学家的研究可以看出,现在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在前现代化社会的人均GDP,也就是人均拥有的物质,平均每年的增加只有0.05%,要1400年的时间,每个人物质的拥有量才能增加一倍。西欧国家15世纪以后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新大陆,在新大陆带回来很多财富、黄金和适合于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的粮食新品种,如玉米、甘薯等,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开始出现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用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按照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工业革命以后,也就是18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突然增加了20倍,每年人均GDP的增长从0.05%变成1%,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就从1400年缩短为70年,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工业化国家,人均GDP的增长又从1%翻了一番,增加到2%,人均GDP增长所需要的时间就从70年减少为35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活70年的话,那么从出生到死亡的物质拥有量可以翻两番,这就是所谓现代化的经济增长。

地理大发现以后,尤其是18、19世纪以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其坚船利炮到世界各地去占领殖民地。美洲、非洲被殖民,亚洲很多国家也被殖民,当时世界上除了这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外,其他地区都是这些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世界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那些被殖民和半殖民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摆脱农业经济进入到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他们和先进的现代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不断地扩大。

人们总是要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世界上出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浪潮”,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原来被殖民或者半殖民的国家纷纷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在他们国家自己的政治领袖的领导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当时的认识是西方国家之所以这么强盛一定有其道理,如果把这些道理学会,就可以用来帮助自己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些国家认为如果要想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政治上必须像西方那些工业化现代化国家那样,实行共和宪政,经济上也必须像西方那些工业化现代化国家那样,实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所谓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发展中国家从二战以后推行西方式现代化至今将近80年普遍不成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做了一些研究来理解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可以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理解,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八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加上奥匈帝国,他们是当时世界的列强,为什么是列强?因为军事力量很强,但军事力量是靠“烧钱”来支撑的,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这八个国家当时的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50.4%。到了2000年,世界上有一个八国集团,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跟八国联军前面七个完全一样,第八个国家是加拿大。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分解成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这八个国家为何组成八国集团呢?因为他们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47%。这八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当

中,他们的经济总量从50.4%下降到47%,只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这八个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总量只增加了3.4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发达国家快,从人均量来看,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和领头的国家相比在不断地扩大。也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现代化的主导下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水平实际上是在扩大的。在西方现代化的现代化下,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西方现代化从理论上讲好像很有道理,因为发达国家就是以那样的方式成功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这种方式却不成功。

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一种现代化形式,从政治上来讲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是西方“轮流坐庄”的共和宪政,在经济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效非常显著。从改革开放到去年为止,我们连续44年平均每年GDP增长达到9%,平均每年的人均GDP增长达到8%。前面谈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增长在过去100多年也就是2%,而我们达到8%,是它们的4倍,所以我们的物质质量增长得非常快。原来,我们曾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已经快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变成发达国家。

除了人均物质拥有量的增加之外,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大特征。

一是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如果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算到现在大约有500多年时间,如果从工业革命开始算,到现在大约有270多年时间,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就有12亿,占到世界人口的比重是15.8%。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是18%,我们现在的人均GDP是12,600美元左右,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13,205美元,我相信到2025年“十四五”规划完成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跨过门槛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当中国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就会从15.8%增加18%变成33.8%。这是一个体量巨大国家的现代化,内部有很大的差距,包括辽宁内部都有很大差距,人口这么多,规模这么大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比小国面临的挑战多很多,但要是实现了现代化,影响也会非常的巨大。工业革命到现在270多年的时间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有12亿人,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跨过门槛,马上就可以让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增加14亿。这是第一点。

二是我们的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从物质质量上确实增长很多,物质极大丰富,但是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两极分化的情形一直得不到缓解,而且还在恶化,对此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有非常详细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则是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第二个不同特征。

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平均而言,物质拥有量不断增加,但精神不断空虚。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体来讲是心理问题,从社会来讲就是各种矛盾的激化。而我们要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的发展。

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是巨大的挑战,全球气候变暖是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大量的排放,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浓度不断增加,形成了温室效应,造成地球温度上升。全球气候变暖是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恶果,而我们走的是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和西方现代化有很大的不同。

五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伴随着殖民掠夺和不断的战争。曾经有人研究美国从1776年建国到现在247年的历史中,只有16年没打仗,除此之外每年都在打仗,而我们是要实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这些目标都非常好,怎么实现对在座的领导干部和同学们是一个挑战。因为人口非常多,各个地

方条件不同,如果是单一目标,过去只要GDP高就可以了,现在是五个目标要同时实现。怎样避免挂一漏万,丢三落四?我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要同时实现这五个特征的关键在于,根据每个地区具有物质第一性特征、在每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把各个地区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首先,各个地方不管是富还是穷,都有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把它变成竞争优势,就可以解决全国面积这么大、各个地方条件不同,经济怎么发展的问题。各个地方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形成竞争优势,如果能够按此进行,人口再多、地方再大,也都能发展得好,都能够贡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其次,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还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首先是建立在富裕的基础上,要实现富裕,收入水平就必须要提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品有竞争力,收入水平就能够不断提高,就能富裕起来。而且,共同富裕是要“共同”的富裕,就必须建立在收入分配公平的基础上,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总体来讲,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在一次分配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政府则在二次分配可以更加改善公平。具体来看,原因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提高一次分配中的经济效率,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通过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实现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这是有效率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处于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发展阶段,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旧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我国现在的人均GDP将近13,000美元,辽宁的人均GDP也才刚超过1万美元,虽然与改革开放前比,我们拥有的资本实现了大幅增长,但是与工业革命以后就开始积累资本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资本仍然是相对短缺的,比如美国人均GDP是7万美元,远远高于我国的人均GDP。所以,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还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当然,跟过去比,现在的资本、技术确实比较密集,但是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们所用的技术更多的还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如果我们发展的是劳动力更密集的产业、采用的是劳动力更密集的技术,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收入较低的穷人和收入较高的富人收入来源最大的差异在于穷人靠劳动的就业获得收入,富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资本的收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给依靠劳动力作为收入来源的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分享发展的果实。而且,从动态来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发展有竞争力,经济增长会很快,资本就会积累的很快,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就会由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低收入者拥有的“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劳动力工资就会快速上涨。举例说明,上世纪80年代家里雇佣一位保姆大约需要几十块钱,到了90年代需要一、两百块钱,而现在则需要几千块。所以当劳动力相对短缺,工资上涨会非常快,相对于工资,资本会越来越便宜,相当于穷人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越来越值钱,而富人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在不断贬值,该过程“自然”地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

2007年我应邀到剑桥大学做马歇尔讲座,用跨国数据来检验各国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收入分配,发现越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其基尼系数越低,代表收入分配越平均,越是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就越大,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具体到国内31个省市,结论亦是如此,即越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省市,其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是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省市,其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所以,如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就能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这是共同富裕的基础。

二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提高政府通过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能力。一个经济体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增速会比较快,政府的财政税收会增多;而且,企业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会具备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补贴就能依靠自己的努力生存。政府不用补贴企业,就可以通过二次分配,将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照顾弱势群体,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投资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等。因此,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国家和政府也能够更好地通过二次分配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再者,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不仅能够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还可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个特征,即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中国有一句古话,“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实现了共同富裕,大家收入增加,而收入差距越来越小,就不会出现“笑贫不笑娼”的问题,就会越发注重礼节、荣辱等精神层次的需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就能够协调发展。

第四,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之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越来越高,而在美好生活的需求当中,当然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大家都富裕了,富裕以后就像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不断增强,党和政府为满足人民这一需求,会更注重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加强生态的治理。而且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符合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在管理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就会盈利,因此会更积极主动地采用绿色技术、遵守环境法规。新结构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越是符合比较优势发展的地区,当地企业也越有能力遵循相关的环保法规,政府才会有更大力度去推行环保政策,环保政策的执行自然就到位。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能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最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定会是和平的发展方式。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有竞争力,就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就会在国内少生产,多从国外进口,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贸易是互利双赢的,在贸易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实现自身经济快速发展,还能够通过不断地扩大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从而给其他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综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路径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一方面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怎样才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呢?新发展理念有五个方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只有这五个目标追求都得以实现,才能称之为完整、准确、全面。为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首先是要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为了提升汽车制造业发展,中国开始和外资企业合资,武汉二汽和法国雪铁龙合资生产富康汽车,采用了和在法国完全一样的全自动化生产,一条生产线投资200多亿元人民币,成本太高,导致亏损严重。90年代,广汽和本田合资生产雅阁汽车,广汽和本田合作只投资了20多亿元人民币,合作非常赚钱。按道理,雅阁汽车排气量2.0升比排气量1.6升的富康汽车高一个档次,怎么投资只有富康车的十分之一?因为雅阁汽车的生产大量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密集的全自动化设备,投资成本大大低于富康汽车全自动化生产线的投资。所以说,技术创新必须符合比较优势。当然,产业发展也要符合比较优势。以深圳为例,它是如何从80年代的小渔村转型升级为当前引领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城市的?关键在于深圳从比较优势出发,最初利用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先行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三来一补”产业,

按照“小步快跑”的方式,保证每一步发展的产业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从而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后实现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产业就可以顺利升级,真正实现“积小胜为大胜”。

同时,因为产业及其产品有竞争力,经济发展会快,财政税收就增加得多,而企业又有自生能力,不需要财政补贴,政府就有更多的“精力”去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补短板的“协调”问题。

并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有自生能力,就会有能力和意愿去遵循环境法规,采用绿色技术来生产,政府也会有意愿来落实环境法规,实现绿色发展。

如前所述,如果企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定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必然是开放发展。

最后,按照比较优势能够创造最大的就业机会,是有利于“穷人”的发展方式。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能够更好地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让政府以最大能力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相当于是共享的发展。

所以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是抓手,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后面的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才能水到渠成。

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方面是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提出来的新的论断与新的政策方针,该政策方针刚被提出时,引发了国内外的诸多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该政策方针是否意味着中国要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外向型发展”走向“内向型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WTO后,我们一直都是提倡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的发展被称为“外向型发展”。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其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即中国是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的第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是互利双赢的,小国得到的好处大于大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作为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其经济规模是我们的1/3,其他国家是我们的1/10、1/20、1/50。如果中国从外向型的经济转向内向型,影响的就不只是中国,对其他和我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國家的影响还会更大。

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政策方针,其实并没有改变中国发展的路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表现。固然2020年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新冠疫情的短期因素有关,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中国防控得当,第二季度生产生活就开始恢复正常,其他国家(地区)则相继暴发,生产生活受到很大抑制,经济出现萎缩,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国内产品必须在国内消化,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新发展格局不是一个为应对传染病制定的短期策略,而是中国长期的发展策略。

另外,也有中美摩擦的因素。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我们不能束手无策,为更好地应对,必须采取在国内进行生产,依靠国内循环的方式。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最常见的是对我国进行的高端技术“卡脖子”的问题,高科技产品的特性是研发投入特别大,技术成功以后的利润取决于市场的容量。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卡中国的脖子,实际是美国基于政治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企业如服从美国政府的要求,会损失很大。此外,绝大多数的高科技产品不只是美国独有,德国、日本、法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美国为维持霸权愿意为政治目的牺牲经济利益,而其他國家如果遵从美国的“脱钩”的政策,牺牲自身利益换来的却是为美国做“嫁衣”,其他國家应该不会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看到德国总理、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主席到中国访问,都是因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是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为应对一小部分美国独有的高科技产品可能被断供的风险,我们必须靠国内自己来生产,但是,其他的产品只要能买,还是买合算,所以,中美争端也不是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主要原因。

新发展格局更为主要的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出的。过去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从出口数据来看,我国出口占GDP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该比重为35.4%,到2019年也就是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前一年,出口比重降为17.4%,也就是国内生产的产品已有82.6%在国内循环。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从35.4%下降到了17.4%,这基本上反映了经济的两个基本规律。一个是现代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很大,如果国内的市场越大,在国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国内市场越少,那么就更需要出口。例如,2019年新加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4.9%,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出口产品当中有些是靠进口零部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是小型经济体,人口规模只有700万人,当制造业达到规模经济以后,大部分产品必须卖到国际市场去。而中国的大部分产品可以在国内消化,所以我们最高的时候也只有35.4%的比重,未到新加坡比重的三分之一。二是,服务业比重越大,不可对外贸易的经济比重就越大,对外贸易的比重会下降。例如,2019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7.6%,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经济规模比中国小,但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经济规模比中国大,其出口比重只是中国出口比重零头的主要原因是美国80%的GDP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当中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所以服务业的比重越高,不可出口部分的“分母”越大,可出口部分的“分子”比重就小。这样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中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了2009年的17.4%,原因在于2006年人均GDP是2099美元,中国经济体量占世界的比重为5.3%,到2019年人均GDP提高到10098美元,中国经济体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6.4%,同时中国服务业比重从2006年的41.8%提高到2019年的53.6%。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出口比重减少一半。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量会不断增加,出口比重就会降低。另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比也会提高,出口的比重也会下降。以上原因都会增加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从2019年的82.6%,将来变成85%、接近90%,甚至超过90%。

既然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论断?原因在于,过去我们长期被认为是外向型经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格局当中如碰到风吹草动、风高浪急,可能就丧失信心。如果是一条小船,碰到大风浪可能会翻船,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大经济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只要我们自己开好船,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我们都能够稳定前进,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全国人民知道真实情况,是增强信心的重要论断。

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过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重要不重要?其实还同样重要。因为如果让我们的国内循环的比重地位更高,经济就必须继续发展,经济发展了,我们在世界上占比就越高。同时,服务业的发展是跟人均GDP的水平成正比,人均GDP增长越快,服务业的占比就越高。要快速发展经济,提高人均GDP的最好办法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对于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把它变成竞争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尽量利用国际资源。对于可能被美国“卡脖子”高科技产品,我觉得华为的任正非先生的策略是最有智慧的,对于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我们需要跟踪,具备做“备胎”的能力。但是,只要买比自己生产便宜,则还是要买,万一被断供了,就可以迅速以“备胎”作为正品来生产。这样就能够完全、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同时又能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对辽宁的建议

那么,辽宁应该怎样发展经济以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做出最大、最好的贡献?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关键是辽宁省内各个市、各个县都要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但是,怎么让企业家自发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进入什么产业,进入一个产业以后能够自发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把经济学的理论变成企业家的自发选择?从新结构经济学来说,需要有两个制度安排:一个是要有“有效市场”,一个是要有“有为政府”。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劳动力多、资本少,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资本价格相对贵,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信号,就会引导企业家进入到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少利用资本的产业,进入产业后采用多利用劳动力、少利用资本的技术来生产。当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积累,资本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时,资本的价格就相对便宜,劳动力价格相对贵,价格信号就会引导企业家进入到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的产业,进入产业以后,更多地采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技术来生产。也就是要实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首先必须有一个能够准确反映各地要素禀赋结构相对丰富程度的要素相对价格体系,这样一个相对价格体系,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够获得。也就是说,要按照比较优势,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各地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采用技术,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当时,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制改革,政府保留了许多市场干预措施,以给予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很多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基本上具备了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政府就不需要再继续补贴。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在转型期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就会引导企业进入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除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也非常重要。按照比较优势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会很快,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会失掉比较优势,需要升级到新的产业、采用新的技术,这样的结构变迁过程,必然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比如需要有企业家先行先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了要承担很大的成本,让后来者知道这样的产业和技术不合适。如果成功了后来者就会跟进,市场就会竞争,先行企业家就不会有超额利润。这样,“聪明的企业家”就会等其他企业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进入,可是,如果没有企业家先行先试,就不会有新产业、新技术出现,经济就不会发展,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先行企业家必要的激励。发达国家的专利就是给先行企业家激励的一种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不能给专利,但是,也需要给先行企业家必要的激励,以鼓励他们先行先试。另外,先行企业家是否能够成功,除了进入的产业是否符合当地新的比较优势之外,还需有和新产业相配套的基础设施、金融支持、具有新的人力资本等。这些事情都存在市场失灵,不是企业家自己能解决,也不是市场就会自发提供的,需要政府针对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需要给予必要的支持。

辽宁怎样利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来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政府一方面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各种扭曲、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必须根据经济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因势利导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定位,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政府作为的目的是让市场有效,当存在市场失灵时,政府缺位,不帮助企业克服,就是政府“不作为”;如果政府的作为超过让市场有效,政府就越位,成了“乱作为”。

2022年辽宁人均GDP是6.88万元人民币,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但是,已经超过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13,205美元已经不远。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新结构经济学把辽宁这样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现有的产业,根据所用技术和世界最前沿技术的差距、是不是具有比较优势、研发周期到底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等三个标准,分成五大类型的产业。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这类产业我们有,比我们发达的国家也有,我们还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比如辽宁的汽车产业;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在该类产业我们拥有的技术已经在世界上处于前沿水平;第三类是转进型产业,该类产业我们过去有比较优势,但现在随着资本累积、工资增长,逐渐失掉比较优势,生产加工需要转移到劳动力密集的、工资比较便宜的内地或是海外;第四类是“换道超车”型产业,在该类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且研发周期比较短、需要比较密集的人力资本投入,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第五类是战略型产业,该类产业研发周期特别长,资本投资特别大,涉及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比如像沈飞,生产新型号的轰炸机、歼击机等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的研发周期。

在这五类产业当中,追赶型、领先型与“换道超车”型产业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比如,对于追赶型产业,我们在中低端环节有比较优势,这些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都有需求,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产品的技术和价值含量。

对于追赶型产业通常采用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方式,具体措施可以通过购买引进含有更先进技术的设备、招商引资、海外并购以及设立海外技术研发中心等,来推动追赶型产业的升级换代。辽宁拥有世界一流质量的工人团体,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就具备人才优势,比如辽宁,现在把全世界最先进的汽车企业引进来,就可以提升我们在汽车产业上的技术和质量优势。

辽宁也有一些技术在世界处于同一行业前沿的领先型产业,对于领先型产业如果要是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功的前提是必须在相关领域的基础科研有所突破,但由于基础科研的前期投入大,取得突破困难,而且,突破后是发表论文,成为公共知识,企业不太愿意投入,需要政府给予支持。比如,对于国际领先产业,可以建立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或者支持大学和企业组成产学研的合作,来研究新技术开发所需要的基础理论。

过去我们依靠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成为了世界工厂,产品进入到全世界的市场。现在随着工资上涨,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成了转进型产业。对于转进型产业,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微笑曲线”两端去经营品牌、产品研发、品质管理或是市场渠道管理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环节,还有一部分生产加工环节可以转移到工资比较便宜的地区,像辽宁西部、中西部的省份,或是海外劳动力多、工资比较便宜的地方去设厂生产。

对于“换道超车”型产业,其特性是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对人力资本要求很高。辽宁拥有100多所大学,在高人力资本人才方面相对而言,拥有比较优势,而且,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市场,同时,硬件配套最齐全,如果需要硬件,从产品概念到成品所需的时间会最短。比如,特斯拉在美国制造新能源汽车花了十几年,只不过生产2、3万辆,到上海投资之后,短短一年就建成了生产线,第二年汽车产量就达50万辆。辽宁有高人力资本人才多、硬件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政府还可以在创业方面发挥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比如,政府可以设立梦想小镇,或把一些老工业基地空闲出来的工厂提供给有新思想新理念的创业团队,创业过程中需要资金,政府可以鼓励风险投资,并配套一定额度的引导资金,助力创业的投融资。在“换道超车”产业上我国已经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比如创立不到十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我国和美国一直在争第

一。另外,美国现在下载量最大的5个软件中有4个来自中国的企业,在这个产业上我国有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规模大、硬件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可以大有作为。

最后,对于战略型产业,目前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但是,其产品和技术为我国的国防安全 and 经济安全所需要。对于这类产业,一般中央财政会给予某种形式的补贴来支持其发展。地方政府则可以借力战略型产业,来发展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配套产业。同时,战略型产业通常拥有比较高端的技术,可以针对国内市场有需求、技术要求不是那么高的产品,下个台阶来生产,我称其为“反弹琵琶”。例如,上世纪80年代沈飞生产的空调机,质量特别好,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我有一位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机就是沈飞制造的,用了十年还运转正常。在辽宁有些技术很密集的战略型产业,可以结合国内国际市场的需要,生产那些技术资本不是那么密集的适销对路产品,获取丰厚的利润,反过来支持战略型产业的研发。

总的来讲,各地要按照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根据现有不同产业的特性来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不断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如果能这样的话,辽宁在三年行动计划中,一定可以“一步一脚印”,每一步都快速成功,“积小胜为大胜”。辽宁在工业、人才和资源等方面都具有雄厚的基础,我相信辽宁会在以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Path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Central Mission and Primary Mission Proposed by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LIN Yifu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thesis elaborates and analyzes the path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central mission and primary mission proposed by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t points out tha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iffers from Western path to modernization by nature. The key to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es in put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to full play and turn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to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y the joint function of efficient market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light of the general trend, Liaoning province should imple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in compliance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realiz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of industries and promote the new breakthroughs of the overall rejuvenation of Liaoning province.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Liaoning

【责任编辑 刘钧霆】